
高举“浙学”旗帜，建设精神富有的文化浙江

张涌泉

（浙江大学文科资深教授、浙学传承与地方治理协同创新中心主任）

十多年前，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政浙江期间，专门邀请浙江省社会科学院吴光研究员作了《中国哲学的的前沿问题与浙学的内涵与精神》的讲座。听完讲座后，习总书记说：“吴光教授的大浙学提法对我们很有启发。这篇文章要继续做下去，要把它做大、做深，我们总结浙江精神不能光从一地一时看，而应该从更广阔的视野、更深的层次去发掘浙江精神。”不久前召开的浙江省第十四次党代会提出建设“文化浙江”的战略部署，藉以为经济社会发展凝聚强大精神力量、提供丰润文化滋养。“浙学”和“文化浙江”这两个关键词，抓住了浙江文化传承与发展的牛鼻子，作为一个浙江的学人，倍感亲切和振奋。在此，很想谈一点自己的感想和体会。

一、弘扬“浙学”，打造与“浙商”媲美的浙江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名片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6年5月17日召开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把繁荣的哲学社会科学提高到和发达的自然科学同等重要的地位。习近平在《讲话》中特别强调了挖掘和阐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性，他说：“绵延几千年的中华文化，是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成长发展的深厚基础。”就浙江的哲学社会科学而言，我们认为这个深厚的基础就是博大精深的“浙学”。自先秦至北宋，浙江蕴育出多元灿烂的文化。宋室南渡后，杭州成为国家政治和经济中心，以及中华文化传承发展的中心，浙学也跃升为中国传统学术文化的主流。千余年来，浙学深刻影响着传统学术的历史变革，重塑了中国思想文化的形态，也为浙江社会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永不枯竭的源头活水。2005年，时任浙江省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在浙商论坛开幕式上指出，浙商源起于浙江独特的文化基因，根源于浙江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习总书记所讲的“浙江独特的文化基因”“浙江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主要就蕴含在博大精深的浙学之中，浙学不但为浙商的脱颖而出提供了深厚的文化土壤，也可作为浙商的进一步发展壮大提供强有力的理论支撑。现在兄弟省份打造的徽学、蜀学、湘学、闽学等风生水起，有声有色，而浙学的影响和美誉度则还很有限。这既和浙学在历史上的崇高地位很不相称，也和浙商在世界上的巨大影响不相般配。浙江的才是中国的，浙江的才是世界的。我们应该努力高举“浙学”的旗帜，做大、做深，让她和浙商一起，成为浙江经济社会文化发展的双子星座，成为浙江的又一张新的靓丽的名片。

二、认真梳理“浙学”的发展脉络，夯实“浙学”的文献基础

如众所知，浙江是吴越文化、江南文化的发源地，是中国古代文明的发祥地之一。这里的秀美山川，诞生了数不胜数的名人巨子，催生了异彩纷呈的学术流派，孕育了多姿多彩的地方文化。从王充的朴素唯物史观，到宋代陈亮、叶适等的事功之学、明代王阳明的心学、明末清初黄宗羲的民本说、清代章学诚等的史学，都在中国学术思想史上产生过重要影响。同时，还涌现了婺学、永嘉学派、北山学派、东发学派、深宁学派、四明学派、戡山学派等以地域为特点的学术流派，各擅胜场，蔚为大观。这些各具特色的思潮流派都是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有必要对它们及其代表人物进行系统的梳理，分析其特点、价值及渊源流变，从而为浙学学科的建立奠定学理上的基础。去年，我们向有关部门建议编纂《浙学通史》《浙学文献编年》等著作，得到了重视和采纳。这两部著作的完成，将使“浙学”的发展脉络更为立体清晰地呈现在我们面前。

与此同时，我们还有必要对浙江的历史文献进行系统全面的整理，夯实“浙学”的文献基础。作为一个学科，不能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而必须有丰富的文献支撑。这种文献，既可以是传世的文献典籍，也可以是地方的档案文书。

1. 传世文献典籍

浙江为文献大邦，自南宋以来著述冠于海内。这是一方出大师、出思想、出理论、出名世之作的沃土。据不完全统计，现存浙江先贤著作约二万种，总数是《四库全书》的3倍以上，群星璀璨，光耀寰宇。《讲话》列举了中国历史上的25个思想家，其中就有王充、黄宗羲、鲁迅三位浙籍先贤。这是我们浙江的光荣，这是我们浙江人的骄傲。

历代有识之士，在浙江文献的搜集整理上，做出过不少贡献，如清代胡凤丹、胡宗懋父子编的《金华丛书》《续金华丛书》，民国张寿镛编的《四明丛书》，刘承干编的《吴兴丛书》，等等，但都局限于一郡一邑，且有较多的遗漏。本世纪初，作为习近平主政浙江期间推出的浙江文化研究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浙江大学浙江文献集成编纂中心为主组织编纂了“浙江文献集成”，目前已出版《沈括全集》《黄震全集》《杨简全集》《郁达夫全集》《陈望道全集》等大家全集7种，还有5种正在排版中，但由于涉及新编、标点、校勘等整理工作，进度较慢；浙江古籍出版社则编纂出版了“浙江文丛”128种519册，速度较快，但系统性有所欠缺。另外浙江文献集成编纂中心组织编纂了《义乌丛书》（中华书局2016年起陆续出版），浙江师范大学黄灵庚教授主编了《重修金华丛书》《衢州文献集成》，李圣华教授主编了《宁海丛书》。这些丛书的编纂，为浙江地方文献的编纂提供了范例。但对留存的巨大的文献总量来说，这些汇编整理工作都还仅仅是局部的、少量的，文献利用不便的问题依然存在。另外，纸寿千年，纸本文献可保存的时间总是有限的，亟需采取更彻底的可传之久远的解决办法。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文化遗产的整理、研究和保护带来了千载难逢的机会。2017年1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专门印发了《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提出加强中华文化研究阐释、中华文化典籍整理编纂出版工作。我们应抓住这一有利机会，乘势而上，乘势而为，在摸清家底、系统梳理的基础上，通过影印、建设数据库等形式，编纂集大成的《浙江四库全书》，打造浙江古代典籍大型书库，为振兴“浙学”奠定坚实的文献基础，并通过这一项目，培养、凝聚“浙学”研究人才，努力推出一批能凸显浙江历史文化厚度的标志性成果。

2. 地方档案文书

地方档案文书是一种记载历史文化的重要载体，与出土文物一样，兼具文物与文献价值。与古籍刊本不同，地方档案文书多为手写本，往往仅限于内部流通，大都为传世的“孤本”，是逝去时代的文化化石和时代印记，具有独特性与不可复制性，它们最真切地反映了普通百姓的生活面貌，极富学术价值、文化价值、经济价值，在推进地方经济和文化的建设中可以发挥重要的作用。因此，地方档案文书的搜集与整理既构成学术基础，又构成了学术前沿，具有文化保存与学术研究的双重价值。20世纪以来，利用地方档案文书逐渐成为潮流。从1950年徽州地区的土地契约大批流入市场，引起历史学家的高度关注，到后来大批徽州文书、清水江文书、福建文书等资料的整理出版，诸多专家学者投身其中，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尤以徽州文书为代表，“徽学”藉此异军突起，成为国内地域文化的三大显学（敦煌学、藏学、徽学）之一。近年来，以地方档案文书为基础的学术研究，一直是中国学术研究最活跃、水平最高的分支之一。

作为文献大邦，浙江公私收藏机构和民间也保存着大量地方档案文书，尤以鱼鳞图册、契约文书及家谱等文书文献存量最巨最具特色，它们是浙学文献资料的重要组成部分。受“徽学”研究的影响，21世纪初，浙江省内外高校科研机构、各地档案馆、博物馆以及私人机构才开始从事浙江地方档案文书的搜集与整理工作，并先后出版了《黄岩诉讼档案及调查报告》《清代浙东契约文书辑选》《绍兴县馆藏契约档案选集》等资料，但搜集和整理的规模较小，且零散而不成系统。整理规模较大的当属《石仓契约》（共5辑40册）和《龙泉司法档案选编》（共5辑80册），都还在陆续出版之中。

2013年7月，我利用个人的科研经费，以浙南、浙中为中心，开始浙江地方档案文书的搜集工作；后来又得到浙江师范大学的大力支持，专门成立了浙学文献馆，目前已搜集到10万余件，成为国内外收藏浙江地方档案文书最多的机构。然而，相对于存量巨大的浙江地方档案文书而言，此仅为沧海一粟，据我们调查得知，浙江民间的契约文书、地籍档案等，若类集出版，

至少在 5000 册以上。这些不可再生资源，随着新农村建设和城镇化进程的加快，正在大量散失消亡，亟待进行抢救性收集与保护。在全面收集的基础上，加以系统整理，可以编纂成大成的《浙江鱼鳞图册汇编》《浙江契约文书汇编》《浙江诉讼档案汇编》《浙江宗谱文献集成》等大型丛书；同时建设浙江地方档案文书数据库，以适应大数据时代的发展需求；还可以考虑建设“浙江契约文书博物馆”“浙江宗谱馆”，等等，从而进一步夯实浙学的文献基础，扩大浙学的影响力。

三、发掘“浙学”中最优秀的文化基因，推动中华文明创造性转化

浙江人遍及全球，浙商誉满天下，但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也会有迷失的时候。如何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征途中“不忘初心，继续前进”？如何“实现精神富有”？如何解决“我是谁？我来自何地？要去何方”的文化迷思？所有这些都需先贤著作中去寻找答案，都需要文化的自信，都离不开精神的支撑。然而中华传统文化浩如烟海，浙学经典汗牛充栋，这里有一个读什么、怎么读的问题。我们有必要编纂一系列的浙学经典普及读物，发掘提炼浙江优秀历史文化中最精华、最经典的部分，让她们从历史文化经典、史乘、文集、笔记、家训中走到最广大的人民群众中间，接地气，扬正气，激发浙江人尤其是青少年爱家、爱家乡、爱祖国热情，从而真正实现《讲话》提出的“推动中华文明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激活其生命力”，“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

总之，我们应该高扬“浙学”的旗帜，深入发掘浙江历史文化中蕴含的精髓，推进我省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为“文化浙江”的建设，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与“思想能源”，为国家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作出浙江人应有的贡献。